

**【锦心绣口】**

不仅询价机构，普通散户同样有风险意识，不会对新股盲目出价，即便出价有失准头，也可自负其责。

**【环宇杂谈】**

各媒体一味报道某某城市发布“引才”政策，却很少有媒体报道，引来了多少人才，留住多少人才。

**【想入非非】**

常平仓以及青苗法思想，在1938年正式纳入《1938年美国农业调整法》，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。

**【思想如虹】**

从懵懂无知到意识觉醒，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几乎不再愿意和家长同框，更不愿意被家长晒于圈中。

新股发行不妨尝试竞价方式

熊锦秋

今年以来科创板、创业板发行市盈率在23倍以下的案例明显增加，大部分IPO定价都给二级市场留下了获利空间，打新依然稳赚不赔，而发行人募资多数不及预期。笔者认为，注册制下股票发行定价机制仍有待改革完善。

此前上纬新材以每股2.49元的发行价完成“擦地发行”，在初步询价阶段，99.3%的配售对象精准地给出了2.49元的报价，有人怀疑投资者“协商报价”。但直到目前，询价机构仍未彻底摆脱“协商报价”嫌疑，比如最近某科创板股票询价，400多家询价机构几乎都是直到报价系统关闭前最后几分钟才出价，且近七成机构报价连小数点后两位都一样。

截至4月20日，今年科创板已有51只新股完成发行，其中有38只新股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；创业板今年以来已有54只新股完成发行，只有5只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。随着新股源源不断上市，加上询价机构回避风险的需求，新股发行市盈率走低，部分确实是市场调节的结果，然而对于有些新股上市后就暴涨10倍，很难让人相信询价机构在一级市场准确发现了新股内在价值，注册制下新股市场化发行沦为空谈。

事实上，目前科创板、创业板新股发行的大头都由询价机构包圆。比如在科创板，若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低于4亿股，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公开发行业量的70%，若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、网下网上回拨10%，也即至少有60%的公开发行

量被询价机构截留。创业板大致相同，只是上述回拨比例提高到20%，但至少50%以上新股被询价机构所截留。

针对询价机构协商报价嫌疑，此前交易所、科创板自律委、中国证券业协会齐发声，呼吁买方机构应遵循独立、客观、诚信的原则规范参与新股报价，不打听其他机构报价信息。不过，由于几百家询价机构圈子过小，主要包括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、保险公司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，询价机构相互交流报价信息、协商报价很容易做到，而监管部门要查证落实协商报价却比较困难。

可以说，目前新股以询价发行为主的发行机制必须有所改变，为此不妨尝试“竞价发行”方式。《新三板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

管理细则》明确了新股竞价发行机制，竞价发行与询价发行总体办法大致相似，但两者一个最大区别，就是竞价发行中参与申购新股投资者具有相当广泛性，除了发行人及其股东、实控人、董监高和其他员工等利益关联人之外，都可参与新股申购；竞价发行不再区分网上和网下，所有投资者都在一个槽里吃饭，新股发行不再只是询价机构的盛宴。

科创板、创业板新股发行完全可以引入竞价发行机制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中小投资者有新股定价能力。不仅询价机构，普通散户同样有风险意识，不会对新股盲目出价，即便出价有失准头，也可自负其责。如果认为所有投资者都参与竞价发行的改革风险太大，也可对新股发行实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，比如规定股票投资经历

在5年以上投资者方可参与竞价发行。

其次，砍掉询价机构独食有利于市场公平。现在询价发行让一二级市场出现制度性差价，其中利益多半被询价机构赚走，且在网下发行中，公募基金、社保基金、养老金、企业年金基金、保险资金又可享受特殊待遇，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参照享受待遇；社保基金等享受特殊待遇尚可理解，但境外投资者也享受超国民待遇，其中公平性存疑。

其三，竞价发行形成的价格更趋于市场价格。新股竞价发行，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有资格参与竞价发行，一二级市场所产生的价格，当然更接近二级市场价格，发行价格更为公道，对发行人也更为公平，募集更多的资金可用于企业经营。

(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)

“抢人才”的乱象

李宇嘉

近期，笔者到内地某三四线城市调研楼市。在座谈交流时，一位开发商的朋友大倒苦水，他和爱人是本市“XX计划”在2018年引进的人才。这个“XX计划”挺诱人的，对新引进的硕士研究生，按照该计划可享受3年的租房补贴，补贴金额为2400元/年，购房补贴为一次性发放8万元。就是冲着这个诱人的补贴，这位朋友和他女友才大老远从四川来到这个城市。

甫一进入城市，自然选择租房。1年过后，他俩结婚并打算买房，去申领这8万的购房补贴时，主管部门表态，他们已经享受了租房补贴，不能再享受购房补贴了。这位朋友顿时就懵了，

当时说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变了呢？有可能是，这位朋友对人才政策掌握有偏差，但笔者更相信的是，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出尔反尔。据悉，后来8万元补贴由一次性发放改为3年到位。

笔者想起另一码事。前几年，西部某大学为通过教学评估，须引入N名博士。条件很优厚，分一套商品房，安排配偶工作。广州某高校毕业的博士乙，兴冲冲地回去了，他是笔者的同学，老家就在中西部这个城市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太坑人了。对方说，确实答应分房子，但没说马上给啊，得排队，啥时排到不好说；确实给配偶解决工作，但只是图书馆后勤，月薪900元。

当然，不排除大环境的问题，但也绝非城市政府没诚意，实在是囊中羞

涩，但又不得不“充胖子”。“抢人才”已经成为一种趋势，已上升为衡量政府是不是致力于转型，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手段了。如果所有城市加入“抢人才”大战，城市间竞争激烈，引入条件就越来越优越了，你发钱，我也发钱，你给房，我也给房。问题是，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消费得起。

深圳、杭州抢人，不管本硕博，一来了就发人才补贴或租房补贴，买房可以打折。但对于多数三四线城市，根本消费不起硕士、博士等高学历人才，但又不得不加入这场竞争中。人社、组织部门、住建部门(建人才房)、当地学校和医院、龙头企业，都要去“抢人才”，或为“抢人才”做贡献。当人才待遇不断被拔高时，这些地方的财政实

力根本承受不起，就出现了上述案例。

而且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这些城市对太学历的人需求并不大，需要的是更多是职业技术类的人，中小学教师、基层医护人员、种植养殖类的人、懂电商营销的人。甚至可以说，需要的是愿意扎根基层的一般学历人才。即便是当地的师范类一般本科学校，培养的应该是服务县乡镇义务教育类人才、中心镇医院的医生和护士，因此对高学历的教师需求并不大。

相反，太学历的人，基于专业特性和过往履历，不太可能在三四线城市扎根。某西部三线城市某师范院校，2017年曾经发布公告，“引入博士、赠送房子”。由于没有约束机制，很多慕名而来的博士，都是为了套利，拿到房

子就马上走人。尽管这是政策设计上的漏洞造成的，但我们不得不深思，相对落后的地方，内地三四线城市等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？

近些年，各媒体一味报道某某城市发布“引才”政策，却很少有媒体报道，引来了多少人才，留住了多少人才。当大家“抢人”的手段单一，“留人机制”不到位时，即便是二线城市，也不一定抢得到真正的人才。其实，中西部省会城市抢人力度不可谓不大，但效果不见得好，有的内地985高校，本省就业率不足30%。契合本地的实际需要，就是人才，而不是唯学历论。之所以很多地方管理部门不得不唯学历论，在于根本不知道，本地需要什么人。

(作者系房地产资深研究人士)

王安石与美国农业部立法

蔡非

北宋宰相王安石的青苗法又被称作“常平新法”。因为这项政策并非凭空发明，而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“常平仓”基础之上的创新。

“常平仓”本身很简单，古代官府在丰年购入粮食，以免谷贱伤农，到荒年则卖出粮食以稳定粮价。从西汉时期开始，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断续实行了2000年。

而到王安石手中，“常平仓”制度进化成为一种农业贷款，即以常平仓里的粮食为本钱，在青黄不接时约定利息借给农民。在收获后，农民可根据当时的粮价选择以谷物或现金归还。

这么做有三个好处：一，保护了粮食生产者——农民不至于因为缺乏现金破产。二，平抑了物价，增进了社会

稳定。三，增加了国库收入。

到了20世纪初，一位叫陈焕章的晚清留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博士论文《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》，将常平仓与青苗法，介绍给了国际经济界。

陈焕章没有料到的是，这篇论文吸引了一位重要美国人，那就是后来曾先后担任美国农业部长、副总统、商业部长的亨利·阿加德·华莱士(以下简称华莱士)。

在陈焕章的论文发表后，华莱士明显对常平仓和青苗法产生了兴趣，在他担任主编的《华莱士农民》杂志上(当时这本杂志在美国农业界有影响力)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了几年。

华莱士在1933年正式进入政界开始担任美国新政期间的农业部长，

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解决大萧条中的根本问题：农业。

30年代美国农业萧条，存在一个大背景和小背景。

大背景是生产过剩。美国是农业出口大国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粮食的需求大增，美国农业提高了产量和效率。但是到了战争结束，各国市场日益封闭。美国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了。而国内市场又消化不了，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。

而当时的美国人有1/4从事农业，价格暴跌最终导致这些人收入减少，还不起贷款。最终引发了全面大萧条。

小背景则是气候变化。由于多年来的滥砍滥伐，美国30年代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壤风蚀形成的沙尘暴。在1934-1936年、1939-1940年美国出

现严重旱灾，作物大面积绝收，人员和大批牲畜死亡。在30年代少数年份，粮食价格又出现了暴涨。

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国家粮食储备制度，私人农场主也较少储存粮食，所以美国在30年代出现了大量失业以及饥饿现象。

华莱士作为农业部长，首先在农业部下设成立了一家“商品信贷公司”，负责向农场主发放贷款，贷款到期后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选择以农产品或者现金来还贷。明眼人可以看出，这正是王安石的青苗法的变种。

华莱士也不否认这一点，他多次在谈话中指出，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形势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相似，所以解决问题也相似。

正如王安石的青苗法遭遇的激烈反对一样，华莱士在美国也曾遭遇批

评。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·S·大卫教授就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上无法执行，但他也指出，这项政策的灵感来自中国。

华莱士的计划主体虽然和青苗法相同，但实际却还有一些关键点不尽相同：一，对农场主的贷款发放是有条件的，即接受“耕作面积限制”，农场主必须主动减少产量来避免生产过剩。二，不同于王安石把青苗法具体实施托付给地方政府的做法，美国选择将贷款收交给专门的贷款企业。

常平仓以及青苗法思想，在1938年正式纳入《1938年美国农业调整法》，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。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，却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，这也是史料未及了。

(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)

你还在朋友圈晒娃吗

马虹玫

孩子上中学以后，我微信朋友圈的画风变了。图里很难刷出孩子的同学伙伴。家长们，特别是妈妈们，发圈和点赞的热情明显降低，我自己也成为其中一份子。这个现象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如果要追问，我想，或许是源于某种内心深处的倦怠感。

小学六年里微信积攒了不少家长，打开朋友圈，总能刷到同班孩子。学习表现，才艺考级，兴趣班上课，美术手工作品，假期周末的游玩娱乐等等，孩子们在朋友圈内忙得不亦乐乎。主题高度集中，内容十分丰富，堪称可谓一部又一部儿童成长史。小学阶段集体活动多，学校组织的，年级开展的，还有班上和家长们小团队自发张罗的，每逢此时，朋友圈晒娃也迎来高光时刻，孩子

们在线下集体活动，家长们在线上集体活动，两边都没闲着。引得朋友圈晒娃气氛高潮迭起，热闹非凡。

“0-6岁天天晒、一二年级经常晒、三年级偶尔晒、四年级数月晒一次、五年级不晒了、六年级完全消失，什么话都不说了，就像没生过孩子一样……”育儿专家杨超这番话，引发的讨论持续热烈。家长们晒娃从兴致勃勃到销声匿迹，从“昭告天下”般事无巨细，到无话可说的偃旗息鼓，晒娃热情与孩子渐渐长大的年纪，形成了鲜明反差。

以我过来人的浅薄经验，小学阶段的学业那也叫个事，特别在以倡导素质教育的深圳，小学生们因此得以发展多种课外技能。有人说，朋友圈“晒”的是娃，“乐”的却是家长。晒的满足，晒的喜悦，晒出满满成就感。家长

此阶段的“晒娃”，晒的是父慈子孝和岁月静好。

小升初之后，小学同学分散到不同初中，微信家长好友重心转至初中家长。再看朋友圈，有关孩子的内容逐渐减少甚至彻底消失。不晓得是否因新家长之间“初来乍到”的陌生导致。进了初中，号称难过高考的深圳中考，开启了初中生的魔鬼学习模式。孩子的课业负担、学习成绩和青春叛逆成套奉上，再叠加家长们步入中年的职场压力、抚养培育、功课辅导和青春期心理建设的压力，哪一个的杀伤力都不低。那些在小学阶段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，现在也浑身长刺。一个又一个的教育难题痛点，兜头砸向家长，让人应接不暇。说的好听，这叫家长跟着孩子“二次成长”，承认吧，其实就是力不从心。日常忙于监督功课就已精疲

力竭，对于晒娃这事，只觉得它耗时费神并且幼稚。偶尔小心翼翼晒一晒，生怕引来他人嘲笑，生怕被误解为这是某种出于功利的炫耀。

这边晒，家长的心情在变；那边晒，家长的想法也在变。从懵懂无知到意识觉醒，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几乎不再愿意和家长同框，更不愿意被家长晒于圈中。

你不晒，他不晒，我不好意思再晒，渐渐地，晒娃的氛围就冷了下来。

综上，朋友圈晒娃热情递减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：对比鲜明不愿晒，孩子长大了不愿意被晒，家长工作压力大，身体和心理都进入中年疲惫期晒不动了。从前，孩子小时候，一天数次看朋友圈，现在几天看一次。赶上了，就点个赞，没赶上也不刻意去寻觅翻找。

朋友圈的整体关注度下降，随着微信社交份额被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分走，别说晒娃的少了，就连整个微信群的活跃度都不复从前那般活跃。不仅晒娃的少了，晒吃晒喝的也日渐式微，有些人的微信朋友圈干脆只卖货，朋友圈成了广告圈、微商圈(无任何褒贬指向)。微信群成为工作群，别说晒娃了，中年父母们啥都不想晒。什么人生感悟，热点聚焦，热文转发，统统没了吸引力。不管曾经的晒娃是否被解读为张扬，中年父母们一概无奈地收场起来，老实搬砖，专心“鸡娃”，默默品尝育儿路上苦与乐。

当然，话虽如此，我还是很乐意在偶尔刷朋友圈的时候，看到孩子的新老同学们可爱的面孔，并真诚地为他们点赞祝福。

(作者系深圳作家)